

伊拉克战后抗争政治研究文献综述

内容提要：自2003年伊拉克战争以来，伊拉克民众的集体抗争已成为该国当代政治生活的显著标志。国内学者多从宏观角度对其进行定性研究，分析阿拉伯国家整体或中东区域范围内社会抗争的成因、特点和效果等，或分析伊拉克周期性抗议活动的兴起和衰落过程；国外学者则多从微观的层面，采用调查问卷、定量分析、比较研究等方法对伊拉克战后抗争政治进行研究，分析某一次抗议活动具体的成因、组织形式、抗议者的立场等。既有的研究成果为研究伊拉克的社会与政治问题提供了新理论、新视角与新素材，但同时也存在研究资料过于集中、分析范式不明确、抗争与民主化关系研究偏少等问题。本文分析学界对伊拉克战后社会抗争的研究现状，梳理抗争政治理论研究成果，以期为伊拉克战后抗争政治研究奠定基础，引进新的研究范式。

关键词：抗争政治理论；伊拉克；社会运动；民主化

引言

社会稳定是一个传统的研究课题。无论是关于社会冲突的研究，还是关于工人运动和社会革命的研究，长期以来都吸引了众多学者进行分析和探讨。近年来，相较于“抗议”、“革命”、“社会运动”等概念，越来越多的学者转向使用“抗争政治”（Contentious Politics）来分析社会抗争现象。抗争政治是指：政治上构建起来的行动者对其他行动者包括政府代理人提出公共的、集体的诉求。具体而言，即处于从议会政治到暴力革命之连续谱中的民众广泛而间歇性的反抗、斗争活动；从和平请愿、纵火、抗税、抢粮、暴动到有组织的罢工、游行、集会乃至大规模革命都可称为抗争，这些抗争与国家政治的互动联系起来就是抗争政治。^①

自2003年伊拉克战争以来，伊拉克民众的集体抗争行动已成为该国当代政

^① Charles Andrain, *Political Protest and Social Change: Analyzing Politics*,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September 1995, pp. 56-72.

治生活的显著标志。^①其中有激进化的反叛——如伊拉克逊尼派依托“伊斯兰国”（ISIS）的暴动，有介于暴力与非暴力之间的社会运动——如2011年的“伊拉克之春”^②抗议运动、2015年和2018年始于巴士拉的抗议运动以及2019年的“十月革命”^③抗议运动，也有非暴力性质的集体抵制——如2005年逊尼派穆斯林对议会选举的抵制、2018年伊拉克公民对议会选举的抵制。尽管这些事件的暴力程度、规模、参与人员等不尽相同，但它们具有共同点：都是普通民众——通常与更有影响力的公民结盟，并伴随着公众情绪的变化——联合起来对精英、当局、对立者进行的抗争^④，即是抗争政治的剧目表现。

伊拉克当代（2003年后）的政治安排存在结构性矛盾，造成了政治失序，为抗争政治的涌现提供着政治机会。而抗争政治又反作用于该政权的政治发展，重塑它的结构，“最终改变了政权”^⑤，抗争政治即对伊拉克的政权产生重要影响。2015年最初由左翼世俗主义者发起的抗议活动，由于后期萨德尔派（the Sadrists）的加入规模迅速扩大，并最终转变为选举政治，助推由“萨德尔运动”（Sadrist Movement）和伊拉克共产党等组成的“沙戎联盟”（Sairoon Coalition）在2018年5月的议会选举中赢得最多席位。2019年10月，伊拉克爆发自2003年以来最大规模的反政府抗议，政局随之动荡，总理阿迪勒·阿卜杜勒·迈赫迪（Adil Abdul-Mahdi）辞职，当局公布将在通过新选举法后提前举行大选。同时，抗争政治也成为倒逼伊拉克国内进行改革的关键力量。战后伊拉克的“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⑥现实与民众的“议题政治”（issue politics）^⑦需求间产生了巨大矛盾，催生出大量的抗争政治活动，民众抵制宗派政治，抗议由此带来的腐败、庇护主义、政治无为、美伊介入等问题，提出工作、水电等与民生相关的要求，使超越身份政治的社会经济需求重新成为政治议题的中心。而新的抗争活动不同于以往，它“不是部门性的、地方性的或派

^① علي طاهر الحمود، سوسيولوجيا الاحتجاج: قراءة في حركة الاحتجاج المدني في العراق بعد 31 تموز 2015، المجلة السياسية الدولية، ص.705.

^② Abdel Jabbar and Abdel Hussain, “The Iraqi Protest Movement: From Identity Politics to Issue Politics”, Baghdad Beirut Arbeel: Iraq Studies Institute, 2017, p.25.

^③ 同上文。

^④ Sidney Tarrow, *Power in Movement: Social movements and contentious politics*, New Yor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6.

^⑤ 同上文。

^⑥ 身份政治：是指基于群体身份以组织化的方式进行政治行动。参见：Amy Gutmann, *Identity in Democrac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9-10.

^⑦ 议题政治：是指基于政治议题组织政治行动。参见：Abdel Jabbar and Abdel Hussain, “The Iraqi Protest Movement: From Identity Politics to Issue Politics”, Baghdad Beirut Arbeel: Iraq Studies Institute, 2017.

别性的”^①，一种新的抗争政治正在伊拉克形成，要求“针对作为一种体制、文化和实践的整个政治制度”^②进行激烈改革。

民众集体抗争已是伊拉克的社会常态，成为影响其政治走向的关键因素，也成为影响其社会稳定的危险因素。面对当前国内政治乱象，处于国家重建关键阶段的伊拉克，需要在充分认识其抗争政治成因、作用的基础上，谨慎利用抗争的力量对其国内政治做出有效改革。本文分析学界对伊拉克战后社会抗争的研究现状，梳理抗争政治理论研究成果，以期为伊拉克战后抗争政治研究奠定基础。

一、抗争政治理论与研究相关文献述评

（一）抗争政治理论与研究相关文献综述

1. 抗争政治理论形成

第一，抗争政治理论的提出与系统化。抗争政治理论是由学者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领衔，与道格·麦克亚当（Doug McAdam）和西德尼·塔罗（Sidney Tarrow）共同提出的，蒂利和麦克亚当也是政治过程理论（Political Process Theory, PPT）的提出者，因而在理论脉络上，抗争政治理论承袭社会运动理论体系中的政治过程理论。其理论的成型源于有关集体行动的理论迭代，从社会运动理论、革命理论到抗争政治理论，集体行动的理论经历了研究范围逐渐全面的扩大化过程。“抗争政治理论的基本出发点就是要超越传统理论研究的局限，将社会运动、革命等抗争行为的研究置于一个分析框架之下，以相同的概念、相同的分析方法和相似的结论来说明集体行动的内在逻辑。”^③

抗争政治理论的系统化主要呈现在蒂利、麦克亚当和塔罗于2001年合著出

^① Abdel Jabbar and Abdel Hussain, “The Iraqi Protest Movement: From Identity Politics to Issue Politics”, Baghdad Beirut Arbeel: Iraq Studies Institute, 2017, p.26.

^② 同上文。

^③ 谢岳，曹开雄，《集体行动理论化系谱_从社会运动理论到抗争政治理论》，载《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第17卷，第18页。

版的《斗争的动力》^①（*Dynamics of Contention*）^②以及蒂利和塔罗于2006年合著出版的《抗争政治》^③（*Contentious Politics*）^④两部著作中。《斗争的动力》选取了全世界范围内的18例典型抗争事件进行比较研究，探寻并总结这些抗争事件中起主要作用的机制与过程，开创了机制-过程分析范式。《抗争政治》则针对《斗争的动力》一书中的概念界定不清、分析范式不明晰等缺点，做出补充和明确，是系统阐述抗争政治理论的专著，在书中对相关概念做了界定，对机制、过程等做了列举，并总结了抗争政治研究的一般方法。

而抗争政治理论系统中的关系探讨、专题研究则更多地体现在三人各自的专著中。如蒂利在其著作《政权与斗争剧目》^⑤（*Regimes and Repertoires*）^⑥中系统论述了政权特征对抗争动员、形式及手段的影响以及斗争对政权的塑造作用；在《集体暴力的政治》^⑦（*The Politics of Collective Violence*）^⑧中他具体讨论了集体暴力的种类和变化，辨别了促使集体暴力发生和变化的机制与过程；在《抗争表演》（*Contentious Performances*）^⑨中他详述了抗争表演的形成、发展过程，以及它在抗争政治中的中心作用。塔罗则在《抗争的语言》（*The Language of Contention*）^⑩中考察了抗争性语言的构建、传播和持久性；在《门口的陌生人：抗争政治中的运动与国家》（*Strangers at the Gates: Movements and States in Contentious Politics*）^⑪一书中，他将社会运动置于抗争政治领域内进行研究，并将其与国家、政党联系在一起，考察抗争者与国家的关系，得出结论：抗争行为者既不在政治之外，也不是完全在政治之内，他们站在反对和融入之间的不确定地带；在《战争、国家和抗争》（*War, States, and Contention*）^⑫中他展示了抗争运动是如何触发、激励和引导战争进程的，以及它们有

^① [美]道格·麦克亚当、西德尼·塔罗、查尔斯·蒂利著，李义中、屈平译：《斗争的动力》，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年版。

^② Doug McAdam, Sidney Tarrow and Charles Tilly, *Dynamics of Conten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③ [美]查尔斯·蒂利、西德尼·塔罗著，李义中译：《抗争政治》，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

^④ Charles Tilly and Sidney Tarrow, *Contentious Politic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econd revised edition 2015.

^⑤ [美]查尔斯·蒂利著，胡位钧译：《政权与斗争剧目》，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⑥ Charles Tilly, *Regimes and Repertoire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6.

^⑦ [美]查尔斯·蒂利著，谢岳译：《集体暴力的政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⑧ Charles Tilly, *The Politics of Collective Violen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⑨ Charles Tilly, *Contentious Performanc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⑩ Sidney Tarrow, *The Language of Contention: Revolutions in Words 1688–2012*,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ugust 19, 2013.

^⑪ Sidney Tarrow, *Strangers at the Gates: Movements and States in Contentious Polit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⑫ Sidney Tarrow, *War, States, and Contention: A Comparative Historical Study*, University Press Audiobooks, May 9, 2016.

时是如何在战争期间和战争结束后改变政权甚至推翻国家的；在《新跨国行动主义》（*The New Transnational Activism*）^①中他研究了跨国行动主义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国内抗争者的诉求形式和他们的主导战略。

第二，对抗争政治理论的补充及深化。自从蒂利、麦克亚当和塔罗提出抗争政治理论以来，很多学者加入到他们成立的“抗争政治工作坊”中，通过案例研究等方式对该理论做出了补充及深化。阿明扎德（Ronald R. Aminzade）、戈德斯通（Jack A. Goldstone）、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休厄尔（William H. Sewell Jr）四位学者就同蒂利、麦克亚当、塔罗一起尝试研究那些在抗争政治研究中还没有被给予足够重视的领域，合著出版《抗争政治研究中的无声与有声》（*Silence and Voice in the Study of Contentious Politics*）^②一书，他们探讨了情感、空间、时间、领袖、宗教、人口和生命等与抗争政治的关系。以上七位教授的八名研究生的抗争政治研究成果，集结为《国家、政党与社会运动》（*States, Parties, and Social Movements*）^③一书，他们通过对美国、墨西哥、东欧、南亚的案例研究，探讨社会运动与政党、地方政府及国家政府间的关系。

2. 抗争政治研究

第一，抗争政治理论研究。抗争政治理论作为研究社会抗争现象的最新理论，一经提出便受到学界的关注，许多学者对其进行研究，有对该理论和理论提出者（蒂利）的高度评价，如裴宜理（Liz Perry）^④认为抗争政治理论开创了一个新的研究范式；（Roberto Franzosi）^⑤认为蒂利在《政体和剧目》中的研究体现出了该理论简化和解释复杂现象的能力，并提供了独到的理论工具；马克·利希巴赫（Mark Lichbach）^⑥评价蒂利通过抗争政治理论的提出，开创了标准的社会科学方法来研究抗争政治和国家建造。但同时，也存在一些批评的声音，如（Eric Selbin）^⑦认为虽然抗争政治作为一个多层次的概念和多维理论给

^① Sidney Tarrow, *The New Transnational Activis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ugust 1, 2005.

^② Ronald R. Aminzade, Jack A. Goldstone, Doug McAdam, Elizabeth J. Perry, William H. Sewell Jr, Sidney Tarrow and Charles Tilly, *Silence and Voice in the Study of Contentious Polit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eptember 17, 2001.

^③ Jack A. Goldstone ed., *States, Parties, and Social Movement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arch 3, 2003.

^④ 裴宜理：《底层社会与抗争性政治》，载《东南学术》，2008年第3期。

^⑤ Roberto Franzosi, “Book Reviews”, *Contemporary Sociology*, Vol.37, No.2, 2008, pp.164-166.

^⑥ Mark Lichbach, “Charles Tilly’s Problem Situations: From Class and Revolution to Mechanisms and Contentious Politics”,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Vol.8, No.2, 2010, pp.543-549.

^⑦ Eric Selbin, “Mobilization Forum: Response to McAdam, Tarrow and Tilly Contentious Cartography”,

学者们提供了讨论的空间和机会，但对抗争政治作为一个广泛包容的统一场理论持怀疑批判态度，他对将革命、叛乱、社会运动等现象混为一谈研究的效用表示怀疑；赵鼎新^①充分肯定了抗争政治理论中的社会科学因果机制解释法，反对现象性的解读方法，但也同时指出多个不同机制有可能导向同一个社会后果的“多对一难题”，以及过于多的机制间缺乏规律性联系。

第二，抗争政治案例研究。抗争政治研究已经成为一个新的学术领域，研究学者们竞相加入到该领域的研究队伍中来，他们或挑选不同抗争事件、或从不同角度切入，丰富了抗争政治的案例研究。如海尔格·莱特纳（Helga Leitner）、埃里克·谢帕德（Eric Sheppard）和克里斯汀·西亚尔托（Kristin M. Sziarto）^②以美国移民工人自由之旅为案例，探讨了抗争政治的空间性，他们认为包括场所、规模、网络、流动性和社会空间在内的各种空间性（Spatialities），对于抗争政治的想象、实践和轨迹都很重要，抗争者经常同时利用多种空间性，它们以复杂的方式相互牵连，给抗争政治带来意想不到的结果。又如肖恩·夏博（Sean Chabot）和斯特兰·温特根（Stellan Vinthagen）^③以印度独立运动和巴西无地工人运动为例，分析抗争政治中非暴力行动的政治文化。在对抗争政治的案例中，也不乏对于阿拉伯国家抗争政治的分析，如纳丁·西卡（Nadine Sika）^④以埃及“阿拉伯之春”中的青年运动为案例，运用抗争政治相关理论，讨论埃及的青年运动如何发起、埃及政府如何做出回应为青年运动的动员和建立网络创造机会、威胁和限制，并研究了埃及青年运动的抗争剧目怎样改变了埃及政权的专制工具。而在玛哈·叶海亚（Maha Yahya）主编的《叙利亚冲突中的抗争政治：反对、代表和抵抗》（Contentious Politics in the Syrian Conflict: Opposition, Representation, and Resistance）^⑤论文集中，多位学者以2011年开始的叙利亚抗议活动为研究案例，探讨叙利亚国家政府、地方政

Mobilization, Vol.2, No.1, 1997, pp.99-106.

^① 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47-48页。

^② Helga Leitner, Eric Sheppard and Kristin M. Sziarto, "The spatialities of contentious politics",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with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April 2008, pp.157-172.

^③ Sean Chabot and Stellan Vinthagen, "Rethinking Nonviolent Action and Contentious Politics: Political Cultures of Nonviolent Opposition in the Indian Independence Movement and Brazil's Landless Workers Movement", *Social Movements, Conflicts and Change*, Vol.27, 2007, pp.91-121.

^④ Nadine Sika, *Youth Activism and Contentious Politics in Egypt Dynamics of Continuity and Chan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ugust 2017.

^⑤ Maha Yahya, *Contentious Politics in the Syrian Conflict: Opposition, Representation, and Resistance*,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2020.

府、反对派、公民社会在抗争活动中的关系变化，以洞察叙利亚的政治未来。随着抗争政治理论由相关著作的译著引入中国，国内学者也开始了抗争政治的案例研究，如周明和李嘉伟^①以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三国的抗争政治为案例，从国家视角审视欧亚地区抗争政治的典型特征；谢金林^②以2008-2010年典型的网络抗争政治事件为案例，对其类型做出总结性分析；程秀英^③以一组国有企业退休工人在十年抗争过程中使用的抗争话语为案例，分析其抗争话语的演变，揭示国家吸纳社会抗争的途径；肖唐镖^④以抗争政治中的政府回应为视角，分析了当代中国回应抗争的体制。

（二）抗争政治理论与研究相关文献评价

抗争政治理论是社会运动理论的最新发展，它的解释范围囊括了集体抵制、革命、社会运动在内的多种抗争形式，通过结合机制和过程的分析，该理论能够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上对社会抗争进行研究，它不仅是一个认识论，还是分析抗争的方法论，因此很多西方学者以该理论为依据分析社会抗争现象，有比较丰富的学术成果，内容涉及对抗争政治理论的探讨和补充，以及对抗争政治现实的案例研究。相比之下，国内学者进入该领域较晚，在理论研究方面，更多偏向于对该理论本身进行介绍性的研究，而较少对它的底层逻辑、方法论等进行思辨性的分析。在案例研究方面，许多国内学者将抗争政治理论应用于中国的社会抗争现实分析中，为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带来了新的理论与研究视角，但较少见到国内学者将其用于对阿拉伯国家抗争政治的分析之中。

^① 周明，李嘉伟：《国家身份与欧亚地区抗争政治的变奏》，载《外交评论》，2021年第3期，第101-131页。

^② 谢金林：《网络政治抗争类型学研究——以2008-2010年为例》，载《社会科学》，2012年第12期，第25-34页。

^③ 程秀英：《从政治呼号到法律逻辑——对中国工人抗争政治的话语分析》，载《开放时代》，2012年第11期，第73-89页。

^④ 肖唐镖：《当代中国的“维稳政治”：沿革与特点——以抗争政治中的政府回应为视角》，载《学海》，2015年第1期，第138-152页。

二、伊拉克社会抗争研究相关文献述评

（一）伊拉克社会抗争研究相关文献综述

1. 伊拉克战后社会抗争的动力

（1）政治机会结构

政治机会结构指的是：“一些促进或阻止某一政治行动者的集体行动的政权及制度特征。”^①它是抗争政治最主要的动力因素，表现为政权的分裂程度、政治结盟关系、政权与挑战者的关系等，人们据此“决定是否进行动员，抗争的成败也系于这一架构”^②。

第一类，“去复兴党化”政策。战后的伊拉克由什叶派团体主导，而逊尼派穆斯林则遭遇了政治排挤和边缘化，“去复兴党化”政策即是这种排挤的制度性安排，为伊拉克逊尼派的抗争活动提供着政治机会。玛丽娜·卡尔库里（Marina Calculi）^③认为“去复兴党化”使伊拉克社会的很大一部分人疏远了新国家的建设，剥夺了他们成为新国家正式成员的可能性，这一疏远的战略政策产生了自下而上的抵抗，导致了許多激进项目的出现。托比·道奇（Toby Dodge）持类似观点，他观察到被“去复兴党化”的人群中既包括萨达姆政权下的高级官员，也包括普通工作人员、低级官员和普通公民，^④他认为被剥夺公民权的伊拉克人不得不为新伊拉克的建设让路，而大量加入了一个平行的国家，即“伊斯兰国”。^⑤国内学者史廉霏、罗林^⑥和赵国忠^⑦有相似观点，他们认为战后美国在伊拉克实行“去复兴党化”，遣散了大批官员和职员，解散了军队和安全部队，此举动摇了其社会基础，给民兵的崛起和教派暴力冲突提供

^① Charles Tilly and Sidney Tarrow, *Contentious Politic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econd revised edition, p.238.

^② [美] 查尔斯·蒂利、西德尼·塔罗著，李义中译：《抗争政治》，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62页。

^③ Marina Calculi, “Middle East Security: The Politics of Violence after the 2003 Iraq War”, in Louise Fawcett e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Middle Eas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p.232.

^④ Toby Dodge, “Enemy images, coercive socio-engineering and civil war in Iraq”, in M. Turner, and F. P. Kühn eds., *The Politics of International Intervention: The Tyranny of Peace*, Oxford: Routledge, pp. 197–217.

^⑤ Toby Dodge, “Bourdieu goes to Baghdad: Explaining Hybrid Political Identities in Iraq”, *Journal of Historical Sociology*, Vol.31, No.1, 2018, pp.25–38.

^⑥ 史廉霏，罗林：《试论伊拉克周期性抗议运动的政治过程》，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22年第1期，第64页。

^⑦ 赵国忠：《伊拉克战后重建及面临的困难》，载《和平与发展》，2004年第1期，第19页。

了空间。普菲夫纳（Pfiffner）^①也同样认为“去复兴党化”为“伊斯兰国”的壮大“输送”了人员。该政策致使85,000–100,000原伊拉克公职人员失业，造成大量受过教育的人因找不到工作产生挫折感。普菲夫纳分析他们中的许多人因此加入了极端组织的行列，希望能够通过此举使自己在新伊拉克发挥作用。持同样观点的还有埃维林娜·瓦斯科（Ewelina Waśko）^②，她认为解散原伊拉克安全部队以实行“去复兴党化”为“伊斯兰国”创造了大量经验丰富的武装反叛者。她分析安全机构的解散，使成千上万的赤贫者无法生存，致使他们中的许多加入了“伊斯兰国”。而这个庞大的团体不仅接受过军事训练，拥有武器、弹药和装甲车，还具有丰富的作战经验和成型的石油走私网络。

第二类，宗派主义（sectarianism）制度化。在2003年后重建伊拉克国家的过程中，宗派主义侵蚀了伊拉克的国家认同。这不仅仅是因为前国家的解体，也是宗派主义制度化的结果，这是通过两个主要举措实现的：一是宗派议会配额制，二是联邦制。唐纳德·霍洛维茨（Donald Horowitz）^③认为很难在新宪法文件中确定任何旨在减少种族或宗派冲突的机制，这种将宗派主义制度化的安排为抗争政治留下了空间。一方面，如阿巴斯·扎德（Abbas Zadeh）和柯尔曼（Kirmanj）^④所分析的，联邦制加强了一些次级单位，如库尔德斯坦，使它作为一个事实上的独立国家运作，有能力同国家抗争；另一方面，如玛丽娜·卡尔库里^⑤所分析，由于教派配额的制度化，什叶派政党联盟利用他们在数量上的多数优势控制了政治体系。而逊尼派人口占多数的安巴尔省在新的教派联邦国家机构中被严重边缘化，也正是在安巴尔，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建立了他们的控制，给了逊尼派同国家抗争的空间。托比·道奇^⑥和迪伦·奥德里斯科尔（Dylan O'Driscoll）^⑦认为新的宗派制度安排催生了新的威权主义，成为内战升级

^① Pfiffner, J.P., “US Blunders in Iraq: De-Baathification and Disbanding the Army”, *Intelligence and National Security*, Vol.25, No.1, 2010, pp.80–82.

^② Ewelina Waśko-Owsiejczuk, “American Plans to Build Democracy in the Middle East After 9/11: the Case of Iraq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terdisciplinary Political and Cultural Journal*, Vol.21, No.1, 2018, pp.11–32.

^③ Donald L. Horowitz, “Conciliatory Institutions and Constitutional Processes in Post-Conflict States”, *William and Mary Law Review*, 49 (4)2018, pp.1213–1248.

^④ Abbas Zadeh and Kirmanj, “The Para-Diplomacy of the Kurdistan Region in Iraq and the Kurdish Statehood Enterprise”, *The Middle East Journal*, Vol.71, No.4, 2017, pp. 587–606.

^⑤ Marina Calculli, “Middle East Security: The Politics of Violence after the 2003 Iraq War”, in Louise Fawcett e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Middle Eas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p.233.

^⑥ Toby Dodge, *Iraq: From War to a New Authoritarianism*, Abingdon: Routledge, 2012, p.44.

^⑦ Dylan O'Driscoll, “Autonomy Impaired: Centralisation, Authoritarianism and the Failing Iraqi State”, *Ethnopolitics*, Vol.16, No.4, 2017, pp.315–332.

的主要原因之一。加雷斯·斯坦斯菲尔德（Gareth Stansfield）^①认为美国撤军后，宗派政治成为了伊拉克的政治现实，它造成了大众和政治精英之间难以弥合的分裂，公众对政治精英无法超越自身或政党利益，无视人民利益和福祉感到愤怒。史廩霏和罗林^②在分析伊拉克周期性抗议运动时，也认为宗派政治造成的政治精英与大众的分裂为伊拉克多轮的民众抗议活动提供不断扩大的政治机会，大众已经不信任政治精英能够通过党派的力量解决深层次问题，转而采取抗争的形式以达诉求。

第三类，转型时期政体的不稳定性。如果在民主化进程启动时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比较脆弱，那么在从威权体制（authoritarian regime）、独裁体制（dictatorship）或君主专制体制（absolute monarchy）向有一定民主特征且有一定威权特征的混合政治体制过渡的过程中，该国卷入战争的可能性是其他国家的四倍。^③也就是说，处于威权与民主过渡期的政体更容易面临社会抗争。战后的伊拉克即处于旧威权政体解体、新民主政体还未形成的过渡期，其政体的不稳定性为抗争政治的形成开放了机会。国内学者李意^④研究阿拉伯国家的抗争政治时，就指出介于开放和封闭之间的混合体制为社会抗争提供了土壤，当它与中东国家相对薄弱的政治体制相结合时，抗争政治便会发生。马泰斯·博加德（Matthijs Bogaards）^⑤则将伊拉克转型期的宪法与社会不稳定关联，他认为宪法中弱的、非正式的权力分享机制未能提供一个稳定的框架来适应社区紧张局势，它助长了伊拉克的暴力和不稳定。

第四类，政府与抗争者群体的关系。威权主义政权对抗争政治的限制和抵抗，本应是其争取政权稳定和持久的关键。但在中东和北非的威权国家，抗争的国家—社会关系已在不同层面，以社会、文化和组织的各种形式出现。^⑥这是由于政府与抗争者关系的改变造成的，抗争者对政府的认可程度及政府对抗争者的压制或推进程度，是影响政府与抗争者间关系的变量，从两者间关系的变

^① Gareth Stansfield, "The political parameters of post-withdrawal Iraq",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86, No.6, November 2010, pp.1261–1267.

^② 史廩霏，罗林：《试论伊拉克周期性抗议运动的政治过程》，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22 第 1 期，第 65 页。

^③ Edward Mansfield and Jack Snyder, *Electing to Fight: Why Emerging Democracies Go to War*,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2005, p245.

^④ 李意，《阿拉伯国家的抗争政治：动因及结果》，载《外交评论》，2012 年第 4 期，第 148 页。

^⑤ Matthijs Bogaards, "Iraq's Constitution of 2005: The Case against Consociationalism 'Light'", *Ethnopolitics*, 2019.

^⑥ Holger Albrecht ed., *Contentious Politics in the Middle East: Political Opposition under Authoritarianism*,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2010, p.2.

化产生了抗争的政治机会。史廉霏和罗林^①分析战后伊拉克政府腐败严重、执政能力低下，这引发了公众的信任危机，同时腐败和执政力低下又使政府的政治动员能力和控制能力下降，双方关系的改变刺激着其他政治群体挑战的可能。而法比奥·梅龙（Fabio Marone）^②则将伊拉克逊尼派的抗争及“伊斯兰国”在伊拉克产生和发展的政治机会结构，关联到了逊尼派与政府间关系变化的政治过程上，他将2003年-2014年逊尼派与伊拉克政府关系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2003-2005年）是排斥阶段，逊尼派拒绝2003年后的政治秩序，发动反对美国占领的军事叛乱。第二阶段（2006-2010年）是融合阶段，逊尼派政党参与选举并努力加入国家机构，反对萨拉菲圣战组织。第三阶段（2010-2014年）是排斥阶段，逊尼派发动反对马利基政府宗派主义的民众运动。三阶段政治过程又为“伊斯兰国”在伊拉克的成立和发展提供了政治机会结构，“伊斯兰国”也据此制定了其“伊拉克化”战略，使其逐渐融入伊拉克社会环境。

第五类，民主化的失败。抗争政治理论认为，抗争与民主化之间的相互作用是连续不断的，各种民主政体在抗争政治中形成，反过来又影响抗争政治。^③因此民主化的失败成为抗争政治的重要诱导因素。

一些学者将民主化的失败与伊拉克逊尼派的抗争联系起来。如学者多齐尔（Dozier）^④认为正是伊拉克战后民主化的失败，促使部分逊尼派走向了抗争。他认为“去复兴党化”政策使伊拉克的民主失败了，“去复兴党化”导致了精英阶层的重新定位，进而导致了国家的解体，它造成了伴随腐败的政治垄断，对民主造成危害。布鲁克斯（Brooks）^⑤同意多齐尔的观点，认为伊拉克不民主的“新民主”政策给逊尼派制造了被剥夺权利的感觉，驱使逊尼派选择替代的抗争措施：革命。逊尼派的抗争政治有两个时间节点：第一，2005年，因新宪法的亲什叶派属性，什叶派和逊尼派之间的冲突升级，为了获得外部支持，逊尼派与基地组织签署了合作协议，并成立了伊拉克基地组织（AQI）。第二，

^① 史廉霏，罗林：《试论伊拉克周期性抗议运动的政治过程》，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22年第1期，第65页。

^② Fabio Merone, “Sunni ideology, contention and the Islamic State in Iraq”, *Partecipazione e Conflitto*, University of Salento, SIBA, Vol.14, 2021, pp.728-739.

^③ Doug McAdam, Sidney Tarrow and Charles Tilly, *Dynamics of Conten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225.

^④ Dozier, “ISIS Feeds on Iraq’s Political Instability and Oil”, *Global Risk Sights*, 2016.

^⑤ Brooks, D. T., “Legitimate Deliberate Democracy in Transition: Failure in the Democratisation of Iraq by the United States from 2003-2014”, *Small Wars Journal*, 2015.

2010年12月，布鲁克斯称这是民主在伊拉克最终失败的时期，因为尽管阿拉维在选举中获胜，议会还是批准了马利基选择的政府，使伊拉克又退回到去复兴党化，逊尼派在这种情况下转向了下一个联盟：伊拉克伊斯兰国。他认为失败的民主制度、脆弱的伊拉克政治结构以及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为伊斯兰国的发展壮大提供了机会。玛丽娜·卡尔库里^①认为美国在伊拉克强加的民主化战略是一种“健忘症政治”，它将所有萨达姆统治下的国家象征污名化，并从公共领域中将其抹去来重塑伊拉克。这是一个创造新“输家”和“赢家”的政治过程，而其“民主”政策试图去政治化（depoliticize）这个不可避免的政治过程，这种矛盾加剧了该国的政治冲突，引发关于政治秩序的极端替代观点的产生，继而触发一系列暴力抗争。

另一些学者则从伊拉克民主制度的缺陷角度说明其民主化的失败，进而与全社会的抗争行为关联。本杰明·伊萨汗（Benjamin Isakhan）^②认为伊拉克的社会抗争部分来源于其“去民主化”（de-democratization）过程。他分析2010年-2011年的抗议运动来自于伊拉克人民对于新民主制度有效性的质疑，怀疑它们是否只是助长了新形式的威权主义。抗议者们认为新的政治精英在美国入侵后上台，操纵了民主的制度和话语，以保留而非分散权力。托比·道奇^③则认为伊拉克战后的民主制度是一种非正式的协和主义（Informal Consociationalism），其政府组成受到不成文的规则支配，它导致了系统的腐败^④，使社会中更广泛的人群与统治精英和整个制度疏远，引发了选举投票率下降^⑤以及一系列的抗议运动，雷纳德·曼苏尔（Renad Mansour）^⑥认为这些行为是对该制度下统治精英的控诉。看到伊拉克民主制度的缺陷，并将之与抗争关联的还有利亚姆·安德森（Liam Anderson）^⑦、乔安妮·麦克沃伊（Joanne McEvoy）和爱德

^① Marina Calculi, “Middle East Security: The Politics of Violence after the 2003 Iraq War”, in Louise Fawcett e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Middle Eas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p.232.

^② Benjamin Isakhan, “Iraq Democracy in Post Saddam Iraq”, In Benjamin Isakhan and Stephon Stockwell eds., *The Edinburgh Companion to the History of Democracy*,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 407-417.

^③ Toby Dodge, “Iraq’s Informal Consociationalism and Its Problems”, *Studies in Ethnicity and Nationalism*, Vol. 20, No. 2, 2020, pp.145-152.

^④ Toby Dodge, “Corruption Continues to Destabilize Iraq”, Chatham House Expert Comment, 2019.

^⑤ 全国选举投票率从2005年12月70%的峰值下降到2018年的44%，巴格达为33%，巴士拉为10%。

^⑥ Renad Mansour, “Why Iraq’s Elections Were an Indictment of the Elite”, Chatham House, 2018.

^⑦ Liam Anderson, “The Dangerous Legacy of a Flawed Constitution: Resolving Iraq’s Kurdish ‘Problem’”, in Benjamin Isakhan ed., *The Legacy of Iraq: From the 2003 War to the Islamic State*,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5.

华多·瓦西姆·阿布泰夫（Eduardo Wassim Aboultaif）^①，他们认为这种制度对身份从何而来、次国家社区如何固化和改变、国家精英代表其选区的主张的有效性的规定都非常模糊，民主制度的失败推动了伊拉克民众身份和政治动员的重大改变。

（2）组织的作用

第一类，政党的组织动员作用。战后伊拉克的社会抗争大都由底层的人民发起，对伊拉克新社会运动的分析也侧重于其动员的自发性和无领导性，但对抗议活动的深入研究表明，如果没有任何形式的领导和组织，任何运动都无法在一定时期内自我维持，组织和政党仍然是抗争动员和其可持续性的核心。里马·马吉德（Rima Majed）^②在分析伊拉克2015年的抗议活动时，指出一些政党（如伊拉克共产党和萨德尔运动）在协调委员会的框架下加入了这场由群众发起的抗议，并凭借其组织结构的实力重新动员了大量街头抗议者，使运动的长期动员成为可能，并把运动转变为导向选举的政治进程。

第二类，居间联络人的作用。居间联络指的是使没有联系或联系不够紧密的诸地点间形成新联系，^③在抗争政治的动员及发展阶段，早期活动家、意见领袖等人发挥着居间联络人的作用，对抗争活动的组织和推动起到重要作用。基亚拉·洛沃蒂（Chiara Lovotti）和利西亚·普罗瑟皮奥（Licia Proserpio）^④对2019年巴格达街头爆发的十月抗议活动（the October protest movement）进行了微观层面的研究，他们强调在运动扩大化的过程中早期活动者的动员作用，结合分析影响早期活动者决策的结构性因素与自发和创造性因素，总结出促成早期活动者动员成功的三个主要因素：一是通过非等级（non-hierarchical）动员及线上线下双管齐下的“分散沟通”（diffused communication）策略促成大众的自发性参与；二是利用政府暴力镇压造成的“道德冲击”（moral shock）^⑤在同情者

^① Joanne McEvoy and Eduardo Wassim Aboultaif, “Power-Sharing Challenges: From Weak Adoptability to Dysfunction in Iraq”, *Ethnopolitics*, 2020.

^② Rima Majed, “Contemporary Social Movements in Iraq: Mapping the Labor Movement and the 2015 Mobilizations”, Study commissioned by the Rosa-Luxemburg-Stiftung, 2020.

^③ [美] 查尔斯·蒂利、西德尼·塔罗著，李义中译：《抗争政治》，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266页。

^④ Chiara Lovotti and Licia Proserpio, “The October 2019 Protest Movement in Iraq: an Analysis of the ‘Early Moments’ of the Mobilisation”, *Partecipazione e Conflitto*, University of Salento, SIBA, Vol.14, 2021, pp.645-662.

^⑤ Snow, D.A. and D.M. Moss, “Protest on the Fly: Towards a Theory of Spontaneity in the Dynamics of Protest and Social Movement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014, pp.1122-1143.

中建立共识；三是使用带有新“伊拉克性”（Iraqiness）涵义的抗议口号。里马·马吉德^①认为2015年伊拉克的抗议运动虽然没有公开宣布的领导人，但它发展出了活动家网络——协调委员会的领导形式。一些有影响力的活动人士建立并控制了社交媒体平台，在抗议活动中发挥了领导作用。

第三类，部落的作用。在国家力量普遍虚弱且在国际力量的灵活性降低的背景下，阿拉伯穆斯林世界内部落的作用变得日益重要，在伊拉克尤为如此。伊拉克战后，国内的逊尼派呈现部落主义明显上升的态势，其中存在一些对中央政府怀有敌意的部落，他们通过多年的社会动员或准军事动员独立于国家，在抗争政治的组织动员中发挥重要作用。霍舍姆·达伍德（Hosham Dawod）^②分析了2012-2013年伊拉克逊尼派反对什叶派前总理努里·马利基政府的抗议活动，他认为一些部落能够组织静坐示威、建立营地、组织数千人的宴会，甚至占领了连接伊拉克与约旦和叙利亚的国际公路，以及一些以逊尼派为主的重要城市的大部分中心地带，这证明逊尼派部落重要的组织动员作用。

第四类，精英的作用。在战后的伊拉克，什叶派宗教人士的地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其广泛的群众基础大多来自于底层人民，因此在抗争政治中他们能够发挥很强的号召力。萨德尔作为伊拉克战后最重要的精英，数百万贫困的伊拉克城市居民是其政治权利的关键来源，因而其政见对抗争政治的影响巨大，雷纳德·曼苏尔和本尼迪克特·罗宾·德·克鲁兹（Benedict Robin-D'Cruz）^③认为萨德尔长期以来一直奉行“可控的不稳定”（controlled instability）战略，这种战略依赖于在关键时刻对系统进行有限的破坏，以获得公众支持和政治影响力，而近年来其目标是用萨德尔派中心主义取代什叶派中心主义，因此他选择通过抗议来推进改革议程，而拒绝加入一个“现政府”，2022年萨德尔派议员集体退出议会即是例证。同时，两位学者还认为萨德尔的政治动向受到其社会基础的反向驱动，萨德尔派的大部分支持者并没有从他对国家的控制中获益，对他们来说腐败的政治体系是不值得信任的，这也促使萨德尔

^① Rima Majed, “Contemporary Social Movements in Iraq: Mapping the Labor Movement and the 2015 Mobilizations”, Study commissioned by the Rosa-Luxemburg-Stiftung, 2020.

^② Hosham Dawod, “The Sunni tribes in Iraq: between local power, the international coalition and the Islamic State”, The Norwegian Peacebuilding Resource Centre, September 2015.

^③ Renad Mansour and Benedict Robin-D'Cruz, “The Sadrist movement in Iraq Between protest and power politics”,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Programme*, October 2022.

与政治体系保持距离。本杰明·伊萨汗^①则从民主机制的角度分析了萨德尔及什叶派宗教领袖西斯塔尼在抗争政治中的核心作用。他认为二者的抗争政治利用民主的各种机制取得了巨大成效。西斯塔尼采取了前所未有的措施——发布宗教法令，以拒绝美国建立傀儡政府的计划，并呼吁信徒投票。萨德尔号召他的追随者们抗议美国占领，还同时利用了请愿、公民抗命等其他机制来实践抗争政治。

第五类，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及“新公民社会”^②的作用。伊拉克的抗争政治活动逐渐显现由宗派动员到公民社会动员的趋势，非政府组织在抗争的组织中发挥愈发重要的作用。史廉霏和罗林^③分析伊拉克战后，由联合国、国际和欧洲捐助者资助的非政府组织成倍增加，围绕民主、建设和妇女权利等问题投入资金和项目，被新的专业精英群体所接受，新兴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开始探索世俗的跨越阶级和宗派的抗议组织新形式。而萨拉·阿里（Zahra Ali）^④更强调“新公民社会”在伊拉克抗争政治中愈发重要的作用，她认为伊拉克的抗议运动开始体现“新公民社会”的组织形式^⑤，例如参加2015年抗议活动的伊拉克妇女自由组织（OWFI）即是一个类似于“新公民社会”的组织，它独立于国家存在，采取明确的世俗、反伊斯兰主义的话语，其建立妇女避难所等议程甚至违反当地法律，越来越多的类似组织在抗争动员方面发挥作用。

（3）媒体的作用

中西方学者都认为媒体，尤其是社交媒体在伊拉克的抗争政治，特别是其新社会运动中发挥着越发重要的组织、联络、动员作用，成为抗争动员的关键因素。

第一类，社交媒体的作用。艾哈迈德·巴伊亚（Ahmed J. Bahiya）^⑥认为在

^① Benjamin Isakhan, “Despots or Democrats?: Sistani, Sadr and Shia Politics in Post-Saddam Iraq”,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ustralasi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APSA) Conference,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Australia, 2010.

^② Paul Gready and Simon Robins, “Rethinking civil society and transitional justice: lessons from social movements and ‘new’ civil society”,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 Rights*, 2017, pp.956-975.

^③ 史廉霏，罗林：《试论伊拉克周期性抗议运动的政治过程》，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22 第 1 期，第 67 页。

^④ Zahra Ali, “From Recognition to Redistribution? Protest Movements in Iraq in the Age of ‘New Civil Society’”, *Journal of Intervention and Statebuilding*, 2021, pp.528-542.

^⑤ “新公民社会”的组织形式指的是：拒绝非政府组织模式的行动和抗议形式，非政府组织的行动模式由“小项目逻辑”、等级决策、去政治化的专业化所定义。参见：Paul Gready and Simon Robins, “Rethinking civil society and transitional justice: lessons from social movements and ‘new’ civil society”,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 Rights*, 2017, pp.956-975.

^⑥ Ahmed J. Bahiya, “Protest and the Media in Iraq: Introduction, the progress, the protes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cientific and Research Publications*, Vol.5, No.6, June 2015.

抗议的动员过程中社交媒体发挥了关键作用，抗议者们严重依赖新媒体平台的使用。在萨达姆·侯赛因政权倒台后，伊拉克由完全受限的媒体环境转变为中东最不受控制的媒体环境之一，媒体业迎来繁荣时代，但新的控制形式也同时出现，民族宗派“媒体帝国”在伊拉克形成，传统媒体由不同政治、宗教派别间接控制，成为伊拉克政治-宗派分裂的一面镜子，在抗议活动的报道中，可以看出传统媒体是高度定向的。这促使了抗议人士使用社交媒体平台作为替代渠道来宣传和发布观点，因为他们认为社交媒体是少受控制的表达意见和分享想法的场所。埃里克·拉斐尔·克南（Erik R. Kernan）^①则分析了“伊斯兰国”利用社交媒体的高效传播战略：一是利用社交媒体作为讨论圣战意识形态的扩大平台，使其成为新的“激进清真寺”（radical mosque）^②；二是绕过主流媒体，借社交媒体让恐怖分子自己成为恐怖的宣传者，塑造新的“恐怖剧场”（theater of terror）^③；三是通过社交媒体直接与全球潜在招募者建立联系；^④四是通过社交媒体催化“独狼”（lone wolf）^⑤恐怖袭击。

第二类，传统媒体的作用。记者和大众媒体在建立和动员社会运动中发挥着深远的作用。它们通过引发关于经济、贫困和政府腐败等问题的争议性辩论和讨论来影响人们的看法。^⑥海赛姆·努曼（Haitham Numan）^⑦认为媒体在塑造抗争政治方面有着关键作用，通过对报道伊拉克腐败问题的记者进行采访，海塞姆认为他们通过报道传播了对腐败和民主的看法，而伊拉克人民对2018年大选的抵制及2019年的十月革命，正是从记者创造的关于政府腐败和不民主的公众意识中产生的。本杰明·伊萨汗^⑧对由政治、宗派团体控制的“媒体帝国”对伊拉克抗争政治的作用，持和艾哈迈德·巴伊亚不同的观点，他认为伊拉克

^① Erik R. Kernan, “The Islamic State as a Unique Social Movement: Exploiting Social Media in an Era of Religious Revival”, UVM Honors College Senior Theses, 2017.

^② Charlie Winter, *The Virtual 'Caliphate': Understanding Islamic State's Propaganda Strategy*, Quilliam, 2015, p.7.

^③ Mark Juergensmeyer, *Terror in the Mind of God: The Global Rise of Religious Violence* (Third Edition ed.), Los Angeles,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 p.128.

^④ J.M Berger and Jonathon Morgan, *The ISIS Twitter Census: Defining and describing the population of ISIS supporters on Twitter*, The Brookings Institute: Center for Middle East Policy at Brookings, 2015, pp.2-14.

^⑤ Juliette Bronchtein, *The Evolution of Lone Wolf Terrorism*, Mackenzie Institute, 2016.

^⑥ Haryanto, “Journalism and democracy: The role of journalism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democracy in Indonesia”, *International Refereed Research Journal*, No.8, 2017.

^⑦ Haitham Numan, “Analyzing Journalist Perceptions of Democracy and State Corruption: The Case of Iraq”, *Arab Media & Society*, No.29, 2020.

^⑧ Benjamin Isakhan, “The Streets of Iraq: Protests and Democracy after Saddam”, in Benjamin Isakhan and Stephen Stockwell eds., *The Secret History of Democracy*,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1, pp.191-203.

的许多党派和非党派媒体机构通过发表其不同的政见和信息培育了伊拉克的公共领域，伊拉克人在公共领域里公开辩论当今的社会问题，他们渴望获得未经证实的新闻，这种热情也促使各方赞助的媒体百花齐放，它们履行了媒体作为“第四等级”的职能，为伊拉克公民提供了一系列关于关键政策、政治家和政党的丰富辩论和话语，成为抗争政治的动员力量之一。

（4）意识形态的作用

文献研究表明，政治化的集体身份（Politicized Collective Identity, PCI）支持着抗争的开展，以促进群体利益。^①在伊拉克，抗争者集体认同的框架形成于不同方面：

第一类，政党联盟的意识形态基础。由萨德尔运动和伊拉克共产党等其它左翼团体组成的左翼-萨德尔联盟（the leftist-Sadrist alliance），加入了2015年伊拉克的大规模抗议活动，成为其活动的主要组织框架，一些研究者认为这只是政治精英之间的一个“工具性联盟”^②，不具有意识形态上的共同基础，而本尼迪克特·罗宾·德·克鲁兹^③提出了不同意见，他在文化维度上研究了左翼-萨德尔联盟的社会形成和发展，认为此联盟不仅仅是一个政治精英之间的“工具性联盟”，它还具有很深的社会和文化根源。其研究的重点是在巴格达的萨德尔基金会（the Sadrist Foundation），他认为此基金会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萨德尔派和伊拉克世俗文化精英之间的互动，造就了左翼-萨德尔联盟更大的社会根植性，使联盟新的社会关系和意识形态框架得以发展。虽然精英政治的战略利益在联盟的形成中很重要，但联盟社会网络的文化基础也不容忽视。在伊拉克左翼-萨德尔联盟政治的形成中，伴随着文化领域复杂的政治斗争，这也使得萨德尔运动的抗争政治具有更广泛的行动者和实践形式。

第二类，逊尼派抗争的意识形态基础。伊拉克战后逊尼派基于其与战后伊拉克政府排斥-融合-排斥的政治过程，发展了其意识形态——伊斯兰民族主义，它也成为了其抗争政治的意识形态基础。法比奥·梅龙^④应用政治过程理论

^① صالح عدنان ناصر سلومي الكراي، الهوية الجماعية المسيّسة لدى المحتجين، مجلة العلوم السياسية، العدد3، 2021م، ص.233.

^② Damian Doyle, “Pulling and Gouging: The Sadrist Line’s Adaptable and Evolving Repertoire of Contention”, in Dara Conduit and Shahram Akbarzadeh eds., *New Opposition in the Middle East*, Palgrave Macmillan, Sep.2018, p.48.

^③ Benedict Robin D’Cruz, “Cultural Antecedents of the Leftist-Sadrist Alliance: A case study of Sadrist institution building”, *Religion, Violence, and the State in Iraq*, The Project on Middle East Political Science (POMEPS), pp.79-84.

^④ Fabio Merone, “Sunni ideology, contention and the Islamic State in Iraq”, *Partecipazione e Conflitto*, University

分析了伊拉克战后逊尼派的意识形态发展，认为两种意识形态——民族主义和伊斯兰主义/萨拉菲主义（Salafism）——汇合在一起充实了逊尼派的意识形态，它结合了传统的复兴党民族主义和伊斯兰主义以及强烈的萨拉菲特征，它首先作为逊尼派抵抗美国占领的意识形态武器，后来又成为其对抗什叶派政府政治宗派化的回应。而2013年逊尼派对马利基政府的抗议活动遭到残酷镇压，使此次抗议成为一个分水岭，它标志逊尼派抗议运动转变为旨在推翻政府的军事化叛乱的时刻^①，作为其意识形态基础的伊斯兰民族主义也呈现出分离主义的特征。这种发展也为“伊斯兰国”的意识形态框架化提供了机会，使其将自身从被伊拉克民族主义拒绝的伊斯兰国家建设计划，转变为将民族主义融入萨拉菲主义的战略计划。埃里克·拉斐尔·克南^②则分析了“伊斯兰国”的意识形态模型，他认为它形成于三方面：一是利用保守穆斯林对世俗政府非宗教性的不满，倡导跨国界的“乌玛”（Ummah）^③；二是利用阿拉伯国家公民对世俗国家在中东广泛失败的怀疑，削弱世俗国家机构的作用，宣传自身治理的有效性；三是利用穆斯林被全球化进程疏远的不满情绪，表达反西方、反现代的思想。由此，通过宣扬拒绝世俗民族主义、全球化和现代性，“伊斯兰国”获得了重要的意识形态立足点。

第三类，伊拉克国家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基础。战后伊拉克的抗争政治伴随着伊拉克公民国家民族主义思想的觉醒，一方面，伊朗、美国等外国的势力渗透进伊拉克，分化着伊拉克的政党和精英，增强了伊拉克政治领域的宗派主义，伊拉克民众则通过抗争来表达对外国干预伊拉克内政的痛恨，另一方面，伊拉克人民的公民意识逐渐增强，一种以伊拉克国家认同为基础的、超越民族与教派认同的伊拉克国家民族主义显现，逐渐成为伊拉克抗争政治的意识形态基础。切林·查马斯·埃尔丁（Chérine Chamas El-Dine）^④观察到，反教派话语作为2015-2016年运动的一部分出现，他认为这是强烈挑战2003年后以教派基础

of Salento, SIBA, Vol.14, 2021, pp.728-739.

^① Katzman K. and Humud C.E., *Iraq: politics and governance*, Library of Congress,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2015, p.13.

^② Erik R. Kernan, “The Islamic State as a Unique Social Movement: Exploiting Social Media in an Era of Religious Revival”, UVM Honors College Senior Theses, 2017.

^③ 乌玛（Ummah）：阿拉伯语的音译，本意为民族。乌玛是穆斯林最早政教合一的政权，是伊斯兰教初期穆罕默德及其门弟子建立的以麦地那为中心的穆斯林公社，亦称“麦地那穆斯林公社”。

^④ Chérine Chamas El-Dine, “Out of the Ashes: The Rise of an Anti-sectarian Discourse in Post-2011 Iraq”, In H. Kraetzschmar and P. Rivetti eds., *Islamists and the Politics of the Arab Uprisings: Governance, Pluralisation and Contention*,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8.

为政治秩序的第一轮抗议。基亚拉·洛沃蒂和利西亚·普罗瑟皮奥^①在分析2019年的抗议运动时认为，这场运动创造了一种新的、非宗派的、包容性的国家感，即是一种新的“伊拉克性”（Iraqiness）思想，因而“十月革命”中唯一重要的身份是伊拉克人。玛丽亚·路易丝·克劳森（Maria Louise Clausen）^②持同样观点，她认为在2019年10月开始的伊拉克抗议运动既是对寻求外部庇护以巩固其权力的国内政客的回绝，也是对外部行为者的拒绝，这些行为者利用伊拉克国家的弱点增加其对伊拉克政治的影响。抗议者们使用了伊拉克国家民族主义的语言和符号，他们正在走向对伊拉克公民身份的理解。托比·道奇和雷纳德·曼苏尔^③同样认为“十月革命”抗议活动是对伊拉克的宗派制度以及腐败问题的有力批评，他们认为这场运动还开发了一种意识形态基础，它是一种世俗的、统一的伊拉克国家民族主义，它要求所有伊拉克人享有平等的权利和代表权，无论其种族—宗派背景如何。萨拉姆·阿塔拉·沙巴特（سلام عطا الله شباط）^④也认为伊拉克的抗议运动表达了其深刻的社会文化转型，影响了公民的价值观，抗议是对公民身份形成的积极反映。

2. 伊拉克战后抗争政治的特点

第一类，由“身份政治”向“议题政治”转变的抗争诉求。“身份政治”指的是“基于群体身份以组织化的方式进行政治行动”^⑤，伊拉克自2003年以来，“散布种族-宗派言论的团体主导了全国各地的政治动员”^⑥，他们将宗派差异作为“现代政治认同的主要标志”^⑦，塑造了伊拉克的身份政治现实。而“议题政治”指的是基于政治议题而进行政治行动。伊拉克战后的抗争政治活动既要求伊拉克的政治领域由身份政治向议题政治转变，同时也体现着这一转变过程。法莱·贾巴尔（Faleh A. Jabar）^⑧认为2015年发生在伊拉克的社会运

^① Chiara Lovotti and Licia Proserpio, “The October 2019 Protest Movement in Iraq: an Analysis of the ‘Early Moments’ of the Mobilisation”, *Partecipazione e Conflitto*, University of Salento, SIBA, Vol.14, 2021, pp.645-662.

^② Maria Louise Clausen, “The Potential of Nationalism in Iraq: Caught between Domestic Repression and external Co-optation”, Danish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DIIS).

^③ Toby Dodge and Renad Mansour, “Sectarianization and Desectarianization in the Struggle for Iraq’s Political Field”, *Faith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18, No.1, 2020, pp.58–69.

^④ سلام عطا الله شباط، الحراك الشعبي وانعكاسه على المواطنة في العراق بعد عام 2003، مجلة قضايا سياسية، العدد 63، 2020.

^⑤ Amy Gutmann, *Identity in Democracy*,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9-10.

^⑥ Toby Dodge, “Beyond structure and agency: Rethinking political identities in Iraq after 2003”,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2020.

^⑦ Makdisi U., *The culture of sectarianism: Community, history, and violence in nineteenth-century Ottoman Lebanon*,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p.7.

^⑧ Faleh A. Jabar, “The Iraqi Protest Movement: From Identity Politics to Issue Politics”, Translated by Abdul Ilah

动，从根本上说是对伊拉克什叶派政党以宗教的名义垄断权力的拒绝，种族和教派身份的政治化正在失去团结的力量，这种改变体现了伊拉克从身份政治到议题政治的转变，其影响在2018年5月的选举中最为明显，候选人在选举中开始依赖“公民国家”和“反腐败”等词汇来获得其合法性。萨拉·阿里^①持与法莱·贾巴尔相似的观点，认为2015年以来伊拉克的民众抗议运动，助推着向议题政治的转变，她还进一步阐明这种转变伴随着社会由认同（recognition）范式向再分配（redistribution）^②范式的转变。再分配范式对应解决根植于一个社会的政治与经济结构中的社会经济不公正，而认同范式则对应解决根植于代表、解释和交流模式中的文化不公正。伊拉克战后的配额制决定了基于宗教、种族或宗派的政治代表性，因此伊拉克新的精英政治一直被认同范式所主导，而抗议运动则拒绝这一点，倡导由再分配范式所主导的“议题政治”。里马·马吉德^③认为2011年后的抗议活动体现了伊拉克“身份政治”的复杂性，及其在处理民众抗议方面的无用性。他认为基于身份的垂直分化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消除基于阶级的愤怒或掩盖阶级动态，但当动员超出身份领域以及当目标直指控制国家财富的统治阶级时，这种愤怒会迅速重新出现，成为抗议的动力。并且身份政治或宗派策略已不能处理新的抗议运动，尤其是2015年和2018年的抗争活动，它们是在“什叶派地区”动员起来的，反对由“什叶派”政客严重控制并受什叶派宗教领袖影响的政府，这意味着打宗派牌不再奏效。值得注意的一点是，随着抗争活动的继续，学者们对于这一观点也有发展，萨拉·阿里^④在其之后对2019年抗议运动的研究中，就发展了她之前的观点，认为2019年的抗争活动超越了“议题政治”——宗派政党的政治框架，因为抗议运动既发生在政治层面，也发生在社会层面，年轻的抗议者不仅诉求与选举政治和法律权利相关的议题，而且还挑战包括宗教和性别规范在内的社会规范。

第二类，去政治化趋势。伊拉克战后抗争政治活动的一大特点是其主要动

Nuaimi, LSE Middle East Centre Paper Series, 25 June 2018.

^① Zahra Ali, “Protest movements in Iraq in the age of a ‘new civil society’”, Conflict Research Programme, 03 Oct 2019.

^② Nancy Fraser, “From Redistribution to Recognition? Dilemmas of Justice in a ‘Post-Socialist’ Age”, *Justice Interruptus: Rethinking Key Concepts of a Post-socialist Age*, Routledge, 1997, pp.68-93.

^③ Rima Majed, “Contemporary Social Movements in Iraq: Mapping the Labor Movement and the 2015 Mobilizations”, Study commissioned by the Rosa-Luxemburg-Stiftung, 2020.

^④ Zahra Ali, “From Recognition to Redistribution? Protest Movements in Iraq in the Age of ‘New Civil Society’”, *Journal of Intervention and Statebuilding*, 2021, pp.528-542.

员力量的自发性和“无党派”性，大量抗议者坚持抗议的“非政治化”性质，拒绝政党和政治组织，体现了“去政治化”和“个人化”的趋势。里马·马吉德^①分析了2015年抗议运动体现的“去政治化”趋势，认为对这种趋势有两种理解角度：一是走向“去政治化”和非组织化的趋势是对政党政治觉醒的结果，这体现了个人主义不断上升的新自由主义背景；二是面对由国家、非国家行为者及其附属民兵组织构成的不确定的安全环境，抗议者认为不组织反对派政党或阵线更为安全。萨拉·阿里^②则使用“新”公民社会的框架来理解伊拉克抗议活动的“去政治化”趋势，分析其中的一些年轻抗议者们如何与主流社会、政治和过渡范式抗争。与“旧”公民社会相比，“新”公民社会对国家机构和非政府组织（NGOs）都持一定程度的否定，她认为2015年开始的抗议运动就显现出了伊拉克“新”公民社会的一些特征，抗议者们谴责种族一宗派政治制度，反对“身份政治”，拒绝社会和政治生活的伊斯兰化和宗派化，很多抗议者还反对萨德尔派的参与，认为他们是宗派化的和保守的，批评抗议迎合了什叶派伊斯兰运动的“公民”和“民族主义”类型的要求，而不是“世俗”和“左派”的。

3. 伊拉克战后抗争政治的效果

抗争政治是公民通过自下而上的路径参与政治的方式，在西方民主国家，它是直接民主的价值体现。各种民主政体在抗争政治中形成，反过来又影响抗争政治。^③而在阿拉伯国家，尤其是中东威权国家，抗争政治想要发挥对民主的推动作用，机制和过程都要复杂的多。谢岳^④认为，在威权国家里，抗争促进转型的内外部机制并重。除了对抗争本身的要求外，威权国家的政体还有具备一些要素，才能激活抗争对民主的催化作用：一是政体内部存在着结构性衰败因素，即统治集团面临着巨大的危机，体制内精英分裂，改革势力已经力压保守势力占据主导，这样才可能产生抗争同改革势力的联盟；二是国家能力的强弱，如果统治集团保守势力仍然拥有强大的国家能力，那么抗争的结果就是被镇压。因此抗争

^① Rima Majed, “Contemporary Social Movements in Iraq: Mapping the Labor Movement and the 2015 Mobilizations”, Study commissioned by the Rosa-Luxemburg-Stiftung, 2020.

^② Zahra Ali, “Protest movements in Iraq in the age of a ‘new civil society’”, Conflict Research Programme, 03 Oct 2019.

^③ Doug McAdam, Sidney Tarrow and Charles Tilly, *Dynamics of Conten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225.

^④ 谢岳：《社会抗争与民主转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23页。

政治可以成为民主转型的催化剂，但这个催化剂只有在恰当的“政治机会”中才能起反应。^①伊拉克在萨达姆统治下的单极威权主义解体后，产生了与政党政治结合的一种多级新威权主义形式——寡头政治，因此，伊拉克抗争政治的效果要考虑特殊政体下抗争与政治的互动作用。

第一类，政治效果。学者们大都肯定抗争政治对伊拉克政体改革的积极意义，认为社会抗争为其政治带来了改变，哈利斯·哈桑(Harith Hasan)^②就肯定了抗争政治对伊拉克政治改革的关键作用，他认为伊拉克2003年后的政治制度长期生存的唯一途径是彻底改变其性质，接受民族宗派公式的终结。而如果没有日益增长的抗议运动，这不太可能发生；只有强烈的危险迫在眉睫的感觉才能使寡头政治接受真正的让步。而对于抗争政治的案例分折，学者们并不看好其目前的政治效果，指出目前还没有出现由抗争政治带来的实质性变化。如本尼迪克特·罗宾·德·克鲁兹^③在分析2015年的抗议运动时认为，从短期来看，政治精英们没有解决抗议的诉求，而是通过抗议进行增选(co-option)^④，这破坏了改革的可能性。法莱·贾巴尔^⑤持相同观点，他认为这场运动最明显的效果是暴露了什叶派政党的失败，它开启了伊拉克政治领域新的进程，拒绝非伊拉克血统的什叶派政治伊斯兰的进程，以及重新定义伊拉克战后政治及伊斯兰角色的进程。马哈·叶海亚(Maha Yahya)^⑥也持相似观点，他认为萨德尔在2015年早些时候加入抗议活动，是对运动的“劫持”，他通过将自己重塑为改革领袖来遏制什叶派的不满。2015年的抗议运动在2016年衰落，几乎没有实施有效的变革。反观萨德尔派却与共产党人联盟创造了一个新的政治平台，赢得了2018年的议会选举。

第二类，对民主化的作用。抗争政治是实现民主的必要不充分条件，它能够推动民主化的发生，但在不同国情下，抗争政治对民主化的作用会有很多变量，

^① 李意，《阿拉伯国家的抗争政治：动因及结果》，载《外交评论》，2012年第4期，第144-156页。

^② Harith Hasan, "Iraq Protests: A New Social Movement Is Challenging Sectarian Power", *Middle East Eye*, Nov.4, 2019.

^③ Benedict Robin-D'Cruz, "Social Brokers and Lefitist-Sadrist Cooperation in Iraq's Reform Protest Movement: Beyond Instrumental Action", *Middle East Stud.*, Vol.51, 2019, pp.257-280.

^④ 增选：指由现有成员选举或选入机构的行为或程序，或被更大或更成熟的集团同化或接管的行为或过程。

^⑤ Faleh A. Jabar, "The Iraqi Protest Movement: From Identity Politics to Issue Politics", Translated by Abdul Ilah Nuaimi, LSE Middle East Centre Paper Series, 25 June 2018.

^⑥ Maha Yahya, "The Summer of Our Discontent: Sects and Citizens in Lebanon and Iraq", Carnegie Middle East Center: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Jun. 1, 2017.

在伊拉克，抗争政治对民主化的作用就多变且矛盾。本杰明·伊萨汗是特别关注伊拉克社会抗争与民主化互动关系的学者，他的观点即可以体现这种矛盾。一方面，他肯定抗争政治对伊拉克民主的推动作用，他反驳有关伊拉克和民主不相容的东方主义言论，认为当公众抗议对西方民主国家政府的影响在减弱时，伊拉克的抗议仍然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它不仅对重建一个富有参与性的公共环境至关重要，而且还有助于伊拉克向自由、平等和民主的国家转变。通过研究2003年-2009年间伊拉克的抗议活动，本杰明认为伊拉克正在回归一种公民文化，在这种文化中，伊拉克的街道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公共领域”——各种审议、辩论和讨论的场所，各民族、宗派、职业的伊拉克公民都积极利用和参与选举、独立媒体、群众示威等民主机制来表达关切进而影响政治，这有助于创造一个更强大的民主体制。^①同时，本杰明·伊萨汗^②通过从精英的角度分析抗争对民主化的作用，得出了模糊的结论。他认为伊拉克战后的民主，因西斯塔尼和萨德尔领导的抗争政治而存在。但作者同时对西斯塔尼和萨德尔对伊拉克实现真正民主的作用持怀疑态度。对于西斯塔尼，他仍然是一个虔诚的宗教人物，致力于宗教指导，而不是民主政治。而对于萨德尔，作者认为民主是他现阶段的一种政治选择，他主要是利用民主政治的多数派机制来获取权力，他已成为伊拉克选举中的“国王缔造者”，向着集权的方向发展，因此当民主不再适合他的目的时，他是否会继续推行民主还有待观察。除此之外，本杰明·伊萨汗^③也同时认为一些抗议活动对民主进程起着反作用，如2010-2011年的抗议活动遭到了马利基和巴尔扎尼的残酷镇压，伊拉克民族党和伊拉克共产党的办公室和报纸被勒令关闭，抗议者们受到了武装镇压。他认为伊拉克的民主越来越不稳定，它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新的暴力抗争及由此带来的上升的威权主义。因此在伊拉克，抗争不必然带来民主，有时会因为政权的镇压带来反噬效果，造成“去民主化”的发生。在这一点上，希瓦·法尔萨菲（Shiva Falsafi）^④也对伊拉克目前的抗争政治对民主化的推动作用持悲观的态度，他认

^① Benjamin Isakhan, “The Streets of Iraq: Protests and Democracy after Saddam”, in Benjamin Isakhan and Stephen Stockwell eds., *The Secret History of Democracy*,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1, pp.191-203.

^② Benjamin Isakhan, “Despots or Democrats? :Sistani, Sadr and Shia Politics in Post-Saddam Iraq”,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ustralasi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APSA) Conference,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Australia, 2010.

^③ Benjamin Isakhan, “Iraq Democracy in Post Saddam Iraq”, In Benjamin Isakhan and Stephen Stockwell eds., *The Edinburgh Companion to the History of Democracy*,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 407-417.

^④ Shiva Falsafi, “Civil Society and Democracy in Japan, Iran, Iraq and Beyond”, *Vanderbilt Journal of*

为民主化并不仅取决于过渡时期公民社会的力量，更取决于该国的社会运动历史，即过去的公民行动的缺失会极大地限制成功实施政治改革的机会，甚至可能导致“不自由的民主”。他同时认为导致民主变革的公民社会活动往往着眼于国内，并推动国内政治改革，历史上以驱逐殖民统治为目的的民族主义运动不能作为民主改革的先例。因此尽管伊拉克有着殖民斗争的光荣历史，但因缺乏本土社会改革运动的先验，生硬地嫁接民主选举制度将导致民主化的失败。解释了为什么在伊拉克仅仅注重选举和建立民主机构对其实现真正民主化是徒劳的，因为它没有接触过公民社会的真正运作，未能表现出对政治改革的集体准备。

（二）伊拉克社会抗争研究文献综合评价

综合国内外关于伊拉克战后社会抗争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到：国外的学者对伊拉克社会抗争的研究较多，产生了丰富多样的学术成果，他们多从微观的层面，采用调查问卷、定量分析、比较研究等方法对其进行研究，且特别关注伊拉克的抗议运动，对抗议活动的动因和组织形式、抗议人员的立场、抗议活动中精英的行为和作用等都做出了细致的探讨。而国内的学者则多从宏观角度进行定性研究，有在区域视角下进行的研究，比如对阿拉伯国家^①或中东国家^②抗争政治的动因、特点、效果进行的研究，也有在伊拉克抗议浪潮整体视角下的研究，如对伊拉克周期性抗议活动进行的研究^③，这些成果将区域的和国别的抗争政治研究带入了中国学术研究界，丰富了国内的学术研究内容，为区域国别研究带来了新思路。

三、结论

既有的研究成果为研究伊拉克的社会与政治问题提供了新理论、新视角与

Transnational Law, Vol.43, 2010, pp.357-434.

^① 李意，《阿拉伯国家的抗争政治：动因及结果》，载《外交评论》，2012年第4期，第144-156页。

^② 李意，《中东国家抗争政治的特点分析》，载《西亚非洲》，2012年第2期，第53-64页。

^③ 史康霏，罗林：《试论伊拉克周期性抗议运动的政治过程》，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22年第1期，第67页。

新素材，但透过上述研究成果，同时可以看到：伊拉克战后的抗争政治还有继续研究的空间和价值。

首先，研究总量偏少。国内与伊拉克相关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其国家构建问题、库尔德问题、与伊朗的关系问题等，较少有研究涉及到伊拉克战后的民众抗争问题，而民众抗争已经成为了伊拉克战后突出的社会现象，有深入研究的必要性。国外涉及伊拉克民众抗争的研究较多，但大多集中于对于什叶派民众抗议活动的研究，缺少对其它形式和主体的抗争政治研究，特别是少见将逊尼派的抗争政治活动纳入到整体研究的范畴内，而伊拉克的逊尼派作为伊拉克战争前的执政教派，在战后的地位一落千丈，他们抗争的形式、过程与效果与什叶派大众有所区别，也具有研究意义。其次，研究的理论依据不足。现有的研究大都缺乏较为系统的理论依据，一些研究采用了政治过程理论作为理论依据，但基本都将其作为了一个描述性的工具，而没有把理论的应用展开和细化。对于抗争政治理论，则鲜有研究涉及，个别提到该理论的研究也缺乏对该理论的方法论进行应用。而抗争政治理论是社会运动理论的最新发展，对社会抗争现象十分具有解释力，是在研究抗争政治问题时值得采纳的理论依据。最后，对伊拉克抗争政治与民主化关系的研究比较欠缺。抗争政治最重要的使命和作用就是推动民主的发展，所以对两者关系的研究十分必要，而国内外涉及到伊拉克抗争政治与其民主化互动关系的研究文献很少，只有个别学者持续关注这一问题，因此在这一问题的研究上还有很大空间。

综上，本文通过对国内外相关文献的整理与分析，认为可以进行如下研究：将伊拉克战争后伊拉克国内的抗争现象作为研究对象，系统地应用抗争政治理论，在充分认识抗争政治与政体的关系、它形成和发展的一般机制和过程、它的一般结果与作用等的基础上，阐述伊拉克战后抗争政治产生和发展的政治、社会、经济背景，通过案例分析和比较研究的方式，分析不同表现形式下伊拉克抗争政治活动的机遇与威胁、机制与过程、结果与效果，在此基础上探究其特点和对政治发展的影响，尤其关注其与伊拉克民主化的互动作用，从而对伊拉克未来的政治发展和民主化过程进行展望。

参考文献

一、中文参考文献

(一) 专著

1. [美]查尔斯·蒂利著,胡位钧译:《政权与斗争剧目》,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2. [美]查尔斯·蒂利著,胡位钧译:《信任与统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3. [美]查尔斯·蒂利、西德尼·塔罗著,李义中译:《抗争政治》,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
4. [美]查尔斯·蒂利著,谢岳译:《集体暴力的政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5. [美]查尔斯·蒂利著,魏洪钟译:《民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6. [美]道格·麦克亚当、西德尼·塔罗、查尔斯·蒂利著,李义中、屈平译:《斗争的动力》,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年版。
7. 谢岳:《抗议政治学》,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
8. 谢岳:《社会抗争与民主转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9. 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

(二) 论文

1. 程秀英:《从政治呼号到法律逻辑——对中国工人抗争政治的话语分析》,载《开放时代》,2012年第11期。
2. 李意:《阿拉伯国家的抗争政治:动因及结果》,载《外交评论》,2012年第4期。
3. 李意:《中东国家抗争政治的特点分析》,载《西亚非洲》,2012年第2期。
4. 裴宜理:《底层社会与抗争性政治》,载《东南学术》,2008年第3期。
5. 史廪霏,罗林:《试论伊拉克周期性抗议运动的政治过程》,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22年第1期。
6. 王金红,黄振辉:《社会抗争研究:西方理论与中国视角述评》,载《学术研

究》，2012 年第 2 期。

7. 谢金林：《网络政治抗争类型学研究——以 2008-2010 年为例》，载《社会科学》，2012 年第 12 期。
8. 谢岳：《社会抗争：国家性变迁的民间反应》，载《当代中国研究》，2008 年第 2 期。
9. 谢岳，曹开雄：《集体行动理论化系谱-从社会运动理论到抗争政治理论》，载《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 年第 3 期第 17 卷。
10. 肖唐镖：《当代中国的“维稳政治”：沿革与特点——以抗争政治中的政府回应为视角》，载《学海》，2015 年第 1 期。
11. 赵国忠：《伊拉克战后重建及面临的困难》，载《和平与发展》，2004 年第 1 期。
12. 周明，李嘉伟：《国家身份与欧亚地区抗争政治的变奏》，载《外交评论》，2021 年第 3 期。

二、英文参考文献

(一) 专著

1. Amy Gutmann, *Identity in Democracy*,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
2. Benjamin Isakhan and Stephen Stockwell eds., *The Secret History of Democracy*,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1.
3. Benjamin Isakhan and Stephon Stockwell eds., *The Edinburgh Companion to the History of Democracy*,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2.
4. Benjamin Isakhan ed., *The Legacy of Iraq: From the 2003 War to the 'Islamic State'*,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5. Charles Andrain, *Political Protest and Social Change: Analyzing Politics*,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September 1995.
6. Charles Tilly and Sidney Tarrow, *Contentious Politic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econd revised edition 2015.
7. Charles Tilly and Sidney Tarrow, *Contentious Politics*, Boulder: Paradigm Publishers, 2006.
8. Charles Tilly, *Contentious Performanc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9. Charles Tilly, *Regimes and Repertoire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6.
10. Charles Tilly, *The Politics of Collective Violen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11. Charlie Winter, *The Virtual 'Caliphate': Understanding Islamic State's Propaganda Strategy*, Quilliam, 2015.
12. Dara Conduit and Shahram Akbarzadeh eds., *New Opposition in the Middle East*, Palgrave Macmillan, 2018.
13. Doug McAdam, Sidney Tarrow and Charles Tilly, *Dynamics of Conten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14. Edward Mansfield and Jack Snyder, *Electing to Fight: Why Emerging Democracies Go to War*,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2005.
15. H. Kraetzschmar and P. Rivetti eds., *Islamists and the Politics of the Arab Uprisings: Governance, Pluralisation and Contention*,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8.
16. Holger Albrecht ed., *Contentious Politics in the Middle East: Political Opposition under Authoritarianism*, University Press of Florida, 2010.
17. Jack A. Goldstone ed., *States, Parties, and Social Movement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arch 3, 2003.
18. J.M Berger and Jonathon Morgan, *The ISIS Twitter Census: Defining and describing the population of ISIS supporters on Twitter*, The Brookings Institute: Center for Middle East Policy at Brookings, 2015.
19. Katzman K. and Humud C.E., *Iraq: politics and governance*, Library of Congress,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2015.
20. Maha Yahya, *Contentious Politics in the Syrian Conflict: Opposition, Representation, and Resistance*,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2020.
21. Marc Lynch and David Siddhartha Patel eds., *Religion, Violence, and the State in Iraq*, The Project on Middle East Political Science (POMEPS), 2019.
22. Mark Juergensmeyer, *Terror in the Mind of God: The Global Rise of Religious*

- Violence* (Third Edition ed.), Los Angeles,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
23. Makdisi U., *The culture of sectarianism: Community, history, and violence in nineteenth-century Ottoman Lebanon*,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24. Nadine Sika, *Youth Activism and Contentious Politics in Egypt Dynamics of Continuity and Chan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ugust 2017.
 25. Nancy Fraser, *Justice Interruptus: Rethinking Key Concepts of a Post-socialist Age*, Routledge, 1997.
 26. Ronald R. Aminzade, Jack A. Goldstone, Doug McAdam, Elizabeth J. Perry, William H. Sewell Jr, Sidney Tarrow and Charles Tilley, *Silence and Voice in the Study of Contentious Polit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eptember 17, 2001.
 27. Sidney Tarrow, *Strangers at the Gates: Movements and States in Contentious Polit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28. Sidney Tarrow, *The Language of Contention: Revolutions in Words 1688–2012*,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ugust 19, 2013.
 29. Sidney Tarrow, *The New Transnational Activis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ugust 1, 2005.
 30. Sidney Tarrow, *Power in Movement: Social movements and contentious politics*, New Yor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31. Sidney Tarrow, *War, States, and Contention: A Comparative Historical Study*, University Press Audiobooks, May 9, 2016.
 32. Toby Dodge, *Iraq: From War to a New Authoritarianism*, Abingdon: Routledge, 2012.

(二) 论文

1. Abbas Zadeh and Kirmanj, “The Para-Diplomacy of the Kurdistan Region in Iraq and the Kurdish Statehood Enterprise”, *The Middle East Journal*, Vol.71, No.4, 2017.
2. Ahmed J. Bahiya, “Protest and the Media in Iraq: Introduction, the progress, the protes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cientific and Research Publications*, Vol.5,

No.6, June 2015.

3. Benedict Robin D'Cruz, "Cultural Antecedents of the Leftist-Sadrist Alliance: A case study of Sadrist institution building", *Religion, Violence, and the State in Iraq*, The Project on Middle East Political Science (POMEPS).
4. Benedict Robin-D'Cruz, "Social Brokers and Leftist-Sadrist Cooperation in Iraq's Reform Protest Movement: Beyond Instrumental Action", *Middle East Stud.*, Vol.51, 2019.
5. Benjamin Isakhan, "The Streets of Iraq: Protests and Democracy after Saddam", in Benjamin Isakhan and Stephen Stockwell eds., *The Secret History of Democracy*,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1.
6. Benjamin Isakhan, "Iraq Democracy in Post Saddam Iraq", In Benjamin Isakhan and Stephen Stockwell eds., *The Edinburgh Companion to the History of Democracy*,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7. Chérine Chamas El-Dine, "Out of the Ashes: The Rise of an Anti-sectarian Discourse in Post-2011 Iraq", In H. Kraetzschmar and P. Rivetti eds., *Islamists and the Politics of the Arab Uprisings: Governance, Pluralisation and Contention*,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8.
8. Chiara Lovotti and Licia Proserpio, "The October 2019 Protest Movement in Iraq: an Analysis of the 'Early Moments' of the Mobilisation", *Partecipazione e Conflitto*, University of Salento, SIBA, Vol.14, 2021.
9. Damian Doyle, "Pulling and Gouging: The Sadrist Line's Adaptable and Evolving Repertoire of Contention", in Dara Conduit and Shahram Akbarzadeh eds., *New Opposition in the Middle East*, Palgrave Macmillan, Sep.2019.
10. Dozier, "ISIS Feeds on Iraq's Political Instability and Oil", *Global Risk Sights*, 2016.
11. D. T. Brooks, "Legitimate Deliberate Democracy in Transition: Failure in the Democratisation of Iraq by the United States from 2003-2014", *Small Wars Journal*, 2015.
12. Dylan O'Driscoll, "Autonomy Impaired: Centralisation, Authoritarianism and the

- Failing Iraqi State”, *Ethnopolitics*, Vol.16, No.4, 2017.
13. Eric Selbin, “Mobilization Forum: Response to McAdam, Tarrow and Tilly Contentious Cartography”, *Mobilization*, Vol.2, No.1, 1997
 14. Ewelina Waśko-Owsiejczuk, “American Plans to Build Democracy in the Middle East After 9/11: the Case of Iraq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terdisciplinary Political and Cultural Journal*, Vol.21, No.1, 2018.
 15. Fabio Merone, “Sunni ideology, contention and the Islamic State in Iraq”, *Partecipazione e Conflitto*, University of Salento, SIBA, Vol.14, 2021.
 16. Gareth Stansfield, “The political parameters of post-withdrawal Iraq”,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86, No.6, Nov.2010.
 17. Haitham Numan, “Analyzing Journalist Perceptions of Democracy and State Corruption: The Case of Iraq”, *Arab Media & Society*, No.29, 2020.
 18. Harith Hasan, “Iraq Protests: A New Social Movement Is Challenging Sectarian Power”, *Middle East Eye*, Nov.4, 2019.
 19. Haryanto, “Journalism and democracy: The role of journalism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democracy in Indonesia”, *International Refereed Research Journal*, No.8, 1917.
 20. Helga Leitner, Eric Sheppard and Kristin M. Sziarto, “The spatialities of contentious politics”,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with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April 2008.
 21. Joanne McEvoy and Eduardo Wassim Aboultaif, “Power-Sharing Challenges: From Weak Adoptability to Dysfunction in Iraq”, *Ethnopolitics*, 2020.
 22. John D McCarthy and Mayer N Zald, “The Trend of Social Movements in America: Professionalization and Resource Mobiliz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73. And “Resource Mobilization and Social Movements: A Partial Theor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77.
 23. Liam Anderson, “The Dangerous Legacy of a Flawed Constitution: Resolving Iraq’s Kurdish ‘Problem’”, in Benjamin Isakhan ed., *The Legacy of Iraq: From the 2003 War to the Islamic State*,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5.
 24. Marina Calculli, “Middle East Security: The Politics of Violence after the 2003

- Iraq War”, in Louise Fawcett e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Middle Eas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25. Mark Lichbach, “Charles Tilly’s Problem Situations: From Class and Revolution to Mechanisms and Contentious Politics”,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Vol.8, No.2, 2010.
 26. Nancy Fraser, “From Redistribution to Recognition? Dilemmas of Justice in a ‘Post-Socialist’ Age”, *Justice Interruptus: Rethinking Key Concepts of a Post-socialist Age*, Routledge, 1997.
 27. Paul Gready and Simon Robins, “Rethinking civil society and transitional justice: lessons from social movements and ‘new’ civil society”,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 Rights*, 2017.
 28. Pfiffner, J.P., “US Blunders in Iraq: De-Baathification and Disbanding the Army”, *Intelligence and National Security*, Vol.25, No.1, 2010.
 29. Renad Mansour and Benedict Robin-D’Cruz , “The Sadrist movement in Iraq Between protest and power politics”,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Programme*, Oct. 2022.
 30. Roberto Franzosi, “Book Reviews”, *Contemporary Sociology*, Vol.37, No.2, 2008.
 31. Sean Chabot and Stellan Vinthagen, “Rethinking Nonviolent Action and Contentious Politics: Political Cultures of Nonviolent Opposition in the Indian Independence Movement and Brazil’s Landless Workers Movement “ , *Social Movements, Conflicts and Change*, Vol.27, 2007.
 32. Shiva Falsafi, “Civil Society and Democracy in Japan, Iran, Iraq and Beyond”, *Vanderbilt Journal of Transnational Law*, Vol.43, 2010.
 33. Snow, D.A. and D.M. Moss, “Protest on the Fly: Towards a Theory of Spontaneity in the Dynamics of Protest and Social Movement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014.
 34. Toby Dodge and Renad Mansour, “Sectarianization and Desectarianization in the Struggle for Iraq’s Political Field”, *Faith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18, No.1, 2020.

35. Toby Dodge, "Bourdieu goes to Baghdad; Explaining Hybrid Political Identities in Iraq", *Journal of Historical Sociology*, Vol.31, No.1, 2018.
36. Toby Dodge, "Beyond structure and agency: Rethinking political identities in Iraq after 2003",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2020.
37. Toby Dodge, "Enemy images, coercive socio-engineering and civil war in Iraq", in M. Turner, and F. P. Kühn eds., *The Politics of International Intervention: The Tyranny of Peace*, Oxford: Routledge.
38. Toby Dodge, "Iraq's Informal Consociationalism and Its Problems", *Studies in Ethnicity and Nationalism*, Vol. 20, No. 2, 2020.
39. Zahra Ali, "From Recognition to Redistribution? Protest Movements in Iraq in the Age of 'New Civil Society'", *Journal of Intervention and Statebuilding*, 2021.

(三) 研究报告

1. Abdel Jabbar and Abdel Hussain, "The Iraqi Protest Movement: From Identity Politics to Issue Politics", Baghdad Beirut Arbeel: Iraq Studies Institute, 2017.
2. Benjamin Isakhan, "Despots or Democrats?: Sistani, Sadr and Shia Politics in Post-Saddam Iraq",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ustralasi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APSA) Conference,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Australia, 2010.
3. Erik R. Kernan, "The Islamic State as a Unique Social Movement: Exploiting Social Media in an Era of Religious Revival", UVM Honors College Senior Theses, 2017.
4. Faleh A. Jabar, "The Iraqi Protest Movement: From Identity Politics to Issue Politics", Translated by Abdul Ilah Nuaimi, LSE Middle East Centre Paper Series, 25 June 2018.
5. Hosham Dawod, "The Sunni tribes in Iraq: between local power, the international coalition and the Islamic State", The Norwegian Peacebuilding Resource Centre, September 2015.
6. Juliette Bronchtein, *The Evolution of Lone Wolf Terrorism*, Mackenzie Institute, 2016.
7. Maha Yahya, "The Summer of Our Discontent: Sects and Citizens in Lebanon and Iraq", Carnegie Middle East Center: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Jun.1, 2017.

8. Maria Louise Clausen, “The Potential of Nationalism in Iraq: Caught between Domestic Repression and external Co-optation”, Danish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DIIS).

9. Renad Mansour, “Why Iraq's Elections Were an Indictment of the Elite”, Chatham House, 2018.

10. Rima Majed, “Contemporary Social Movements in Iraq: Mapping the Labor Movement and the 2015 Mobilizations”, Study commissioned by the Rosa-Luxemburg-Stiftung, 2020.

11. Zahra Ali, “Protest movements in Iraq in the age of a ‘new civil society’”, Conflict Research Programme, 03 Oct 2019.

三、阿文参考文献

1. سلام عطا الله شباط، الحراك الشعبي وانعكاسه على المواطنة في العراق بعد عام 2003، مجلة قضايا سياسية، العدد 63، 2020.
2. صالح عدنان ناصر سلومي الكرادي، الهوية الجماعية المسيّسة لدى المحتجين، مجلة العلوم السياسية، العدد 3، 2021.
3. علي طاهر الحمود، سوسيولوجيا الاحتجاج: قراءة في حركة الاحتجاج المدني في العراق بعد 31 تموز 2015، المجلة السياسية الدولية.